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年代及相关问题

郭梦雨[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分布于浦阳江流域的楼家桥类型地处强势文化边缘，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中期，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可归纳为独立发展、融合过渡、转变成型三大阶段，反映了该区域逐渐被纳入太湖文化区的变化过程。楼家桥类型不仅是在空间上具有鲜明特征的一个地方类型，同时也是在时间上处于文化系统转变节点的一个过渡类型，是考察文化边缘地带与序列文化区遗存发展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楼家桥类型 性质 年代 序列 文化边缘地带

【中图分类号】：K871.13**【文献标识码】**：A

以浙江诸暨楼家桥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楼家桥类型[1]主要分布于钱塘江支流的浦阳江流域，受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与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面貌。通过与周边区域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比较，本文试对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年代进行讨论，并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出发，梳理浦阳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解析该地区遗存内涵的变迁。

一、楼家桥类型的分期、性质与年代

楼家桥类型发表的材料不多，主要见于浙江诸暨楼家桥遗址下层、浦江上山遗址上层。楼家桥遗址附近的舜湖里、猪山遗址也有这类遗存的分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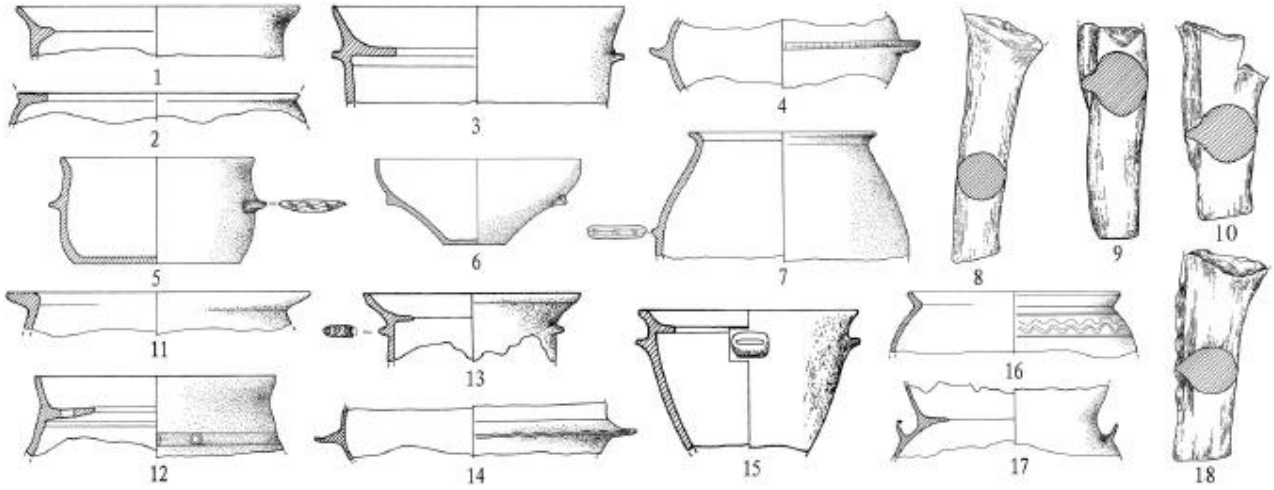
楼家桥遗址临近浦阳江支流凰桐江，于1996年发现，1999年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区分东、西两部分。发掘报告将遗址堆积自早至晚划分为楼家桥文化类型、良渚文化、商周文化三个阶段[3]，其中以楼家桥类型的材料最为丰富，主要包括东区14—26层，西区7—12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炭黑陶为主，器形有鼎、釜、盆、钵、豆、罐、鬶、支脚等，纹饰有弦纹、刻划纹、附加堆纹、水波纹、绳纹等，以弦纹最为普遍，绳纹较少，且主要施于陶釜底部。

遗址东区出土遗物相对丰富，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该区“第23层是一层间歇层，从淤积土层的性状看，显然属于较长时间的泥水沉积土”，“这次潮侵造成遗址较长时间的中断，也导致了遗址文化发展的前后变化”[4]。结合器物分析，发掘者以23层为界，将东区24—26层划分为楼家桥类型早期，14—22层划为楼家桥类型晚期（图一）。

楼家桥遗址的分期可为上山遗址提供参照。上山遗址早、中期遗存分属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晚期遗存主要包括遗址南区④A、④B层和157座灰坑。这批灰坑中有30座发表了陶器资料，其中22座的开口层位清晰。发掘者认为其文化属性和相对年代与楼家桥遗存早期相当[5]。这一阶段出土遗物较少且残损严重，可供比较的器物不多，但仍能分辨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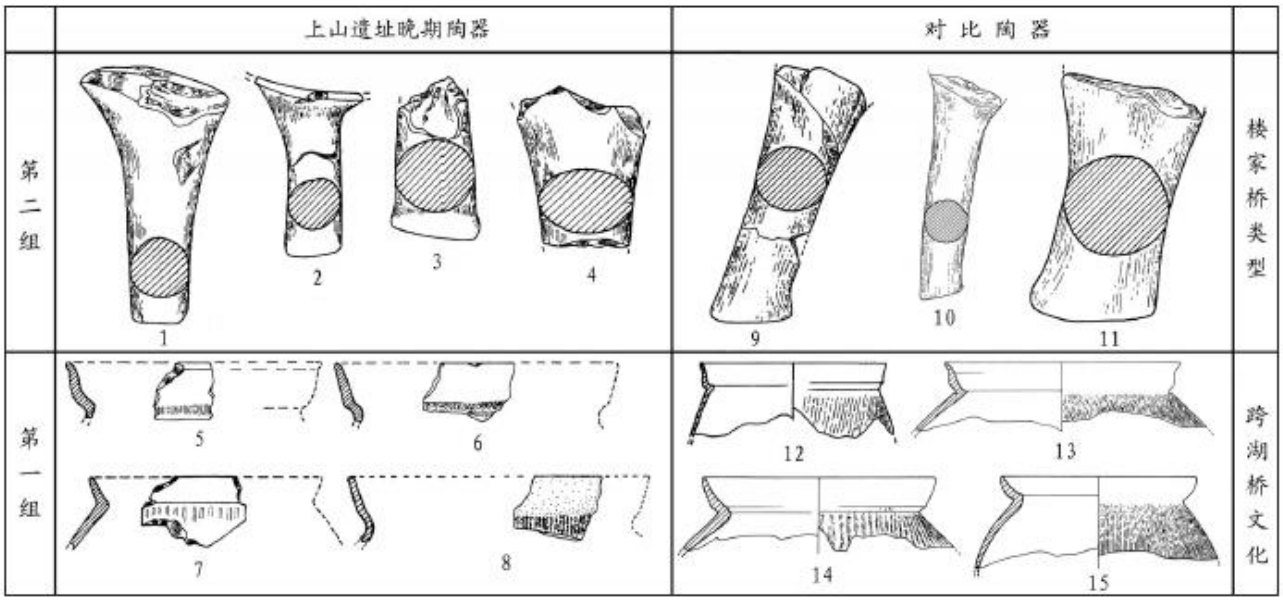
[1]**作者简介**：郭梦雨（1990—），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第一类：包括④层以及开口④层下的 H137、H175、H179、H189、H202、H214 等。这些单位出土遗物具有明显的跨湖桥文化特征。陶釜 H189①：7、T0612④A：27 凹沿或折沿，外颈部施细绳纹，为跨湖桥文化的典型釜型（图二：5、6），与该文化上山遗址 T1209G20①：1、跨湖桥遗址 T0411⑧A：85 陶釜（图二：12、13）相类。陶釜 H175：1、T0612④A：29 口沿下施绳纹（图二：7、8），亦同于跨湖桥文化中的同类器，而不见于楼家桥类型。显然，年代偏早的第一类遗存可归入跨湖桥文化。



图一//楼家桥遗址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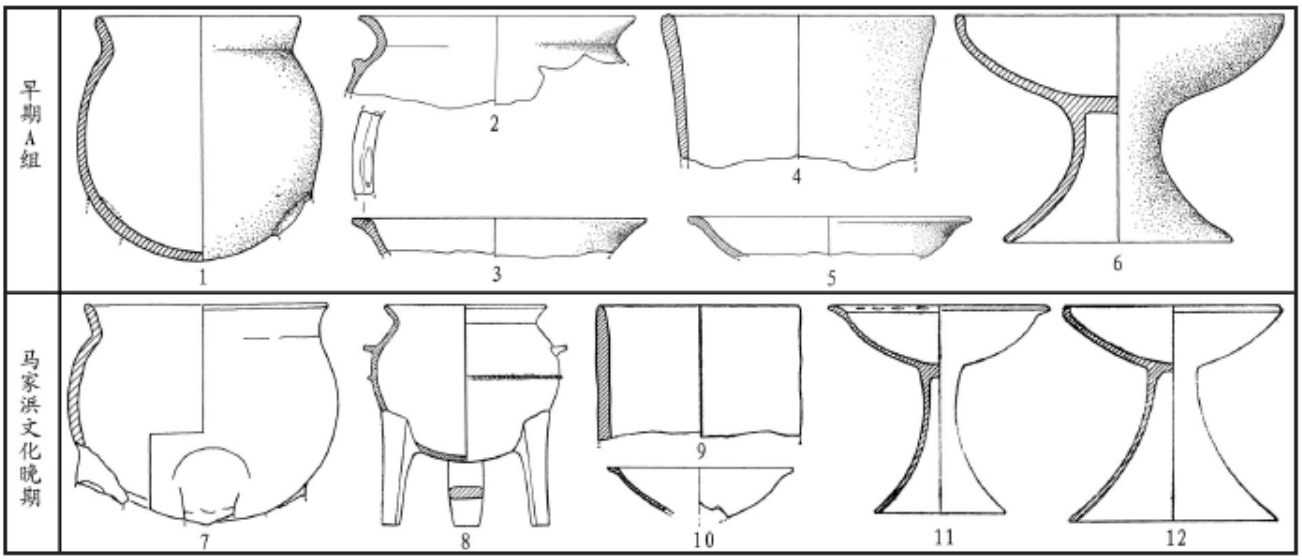
早期：1—3.带隔档器（T0811：2、T0808：44、T0810A：3）4.釜（T0808：32）5、6.钵（T0809A：6、T0809：3）7.鼎（T0807A：7）8—10.鼎足（T0807A：5、T0808：34、T0707A：2）晚期：11.釜（T0707：7）12、13、15.带隔档器（T0809A：14、T0708A：23、T0809：26）14.釜（T0808A：15）16.鼎（T0809：34）17.甗（T0707：8）18.鼎足（T0809：38）



图二//上山遗址晚期陶器的分类与对比

1—4.鼎足（H143①A：11、H152①：5、H186②：5、H143①A：10）5—8.釜口沿（H189①：7、T0612④A：27、H175：1、T0612④A：29）对比陶器：9—11.鼎足（T0811A：11、T0807A：5、H13：2）12—15.釜口沿（T1209G20①：1、T0411⑧A：85、T0511 湖Ⅲ：3、T0410 湖Ⅲ：32）（9—11 楼家桥遗址、12 上山遗址、13—15 跨湖桥遗址）

第二类：以 H143、H152、H186 等为代表的开口于②层下的灰坑。其中出土遗物不见绳纹釜，但包含少量柱状鼎足（图二：1—4），整体文化面貌与楼家桥类型早期接近，二者当属同类遗存，且年代大致相当。综上所述，楼家桥类型早期以楼家桥东区 24—26 层、上山②层下开口的部分灰坑为代表，晚期主要包括楼家桥东区一层。文化内涵方面，早期流行柱状鼎足，有的外缘带有纵向平脊，这一阶段已出现带隔档器。晚期的鼎足一侧发展出扉棱状装饰，盛行水波纹，常饰于陶鼎肩部。



图三//楼家桥类型早期 A 组与马家浜文化晚期陶器的对比

早期 A 组：1、2.鼎（T0808A：5、T0808：16）3.盆（T0808：29）4.钵（T0808A：3）5、6.豆（T0810B：1、T0709A：3）马家浜文化晚期：7、8.鼎（H15：1、图六八：1）9.罐（T5③：4）10—12.豆（T1④：23、图六八：13、M75：1）（1—6 楼家桥遗址，7 庙前遗址，9 崧泽遗址，10 广福村遗址，8、11、12 草鞋山遗址）

地处浦阳江流域的楼家桥类型，在保持地方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北部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东部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强烈影响。通过与二者比较，本文将楼家桥类型早、晚两期均划分出 A、B 两组，分别代表该类型中的马家浜文化因素和河姆渡文化因素，据此来判断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和年代问题（图三—图五）。

早期 A 组：楼家桥类型早期以鼎、豆为代表的遗存马家浜文化特征明显，如陶豆 T0709A：3 喇叭形圈足（图三：6），为马家浜文化豆类器的典型形制；陶鼎 T0808：16 敞口，肩部装对称鋬手（图三：2），与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陶鼎简报图六八：1 鼎[6]（图三：8）相似。目前学界多将陶鼎的出现作为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的标志[7]，故可认为这一组别的年代已晚至马家浜文化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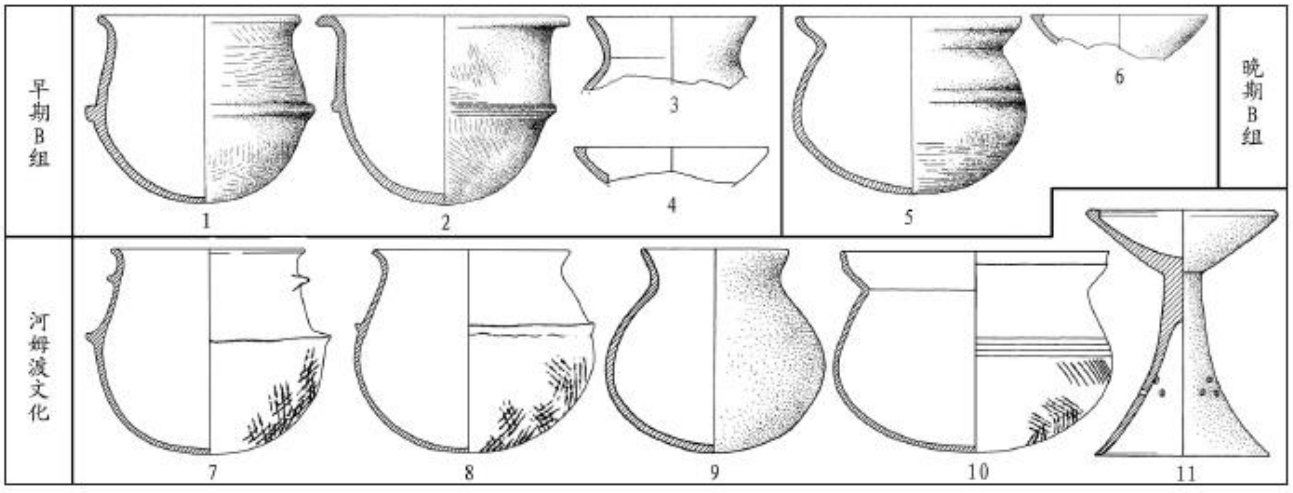
早期 B 组：带脊釜 T080826：5、T0808A25：5 侈口、圜底，腹部带一周突脊，脊下施绳纹（图四：1、2），相似的陶釜还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③层[8]（图四：7、8）。不过，以 T080926：27、T0809A24：2 豆盘（图四：4）为代表的遗物年代明显偏晚。这类陶豆口沿内勾，相同特征的器物，如浙江慈城小东门 T2⑧：1[9]、象山塔山下层 M12：1[10]（图四：11）等，均与河姆

渡遗址②层同时[11]，属于河姆渡文化中期[12]。由此可以确定楼家桥类型早期B组也已晚至这一阶段。

晚期A组：折腹鼎T0809A21：11的造型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遗物T11③a：2[13]相差无几（图五：1、7）；陶鼎T0809A21：13、T0810A19：16器身敞口、束颈（图五：3、4），形制同于崧泽遗址常见的T9③：4一类陶釜（图五：9）。鼎足T0807A：23足尖外撇（图五：6），整体形态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T11③：2[14]（图五：12）相仿。异形鬶T0707：4的两只袋足与另一着地把手构成三足（图五：5），形制与庙前遗址T202⑤：1、H17：11陶鬶相似[15]（图五：10、11）。其他方面，马家浜文化典型的柱状鼎足、喇叭形圈足豆等器类在该组中也都有发现。基于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楼家桥类型晚期A组应与1987年崧泽遗址，1988年、2000年庙前遗址及福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马家浜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皆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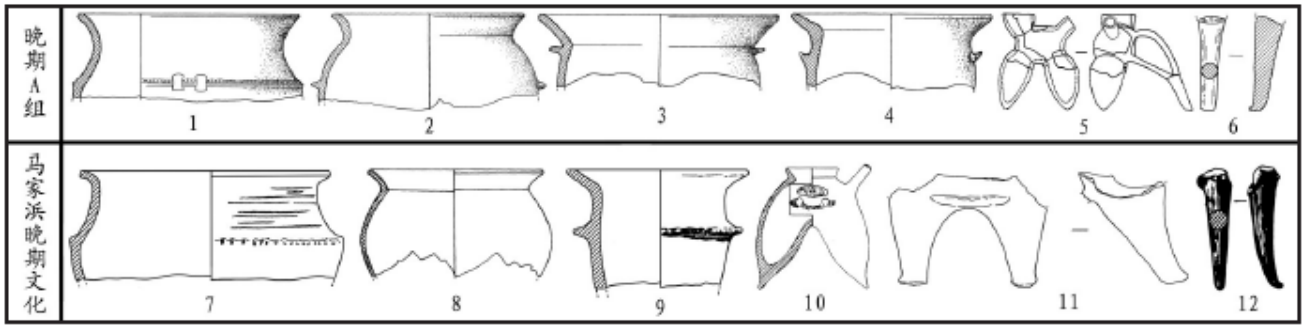
晚期B组：陶釜T0808A：10凹沿、底部施绳纹（图四：5）的特点与河姆渡文化相符（图四：10）；口沿内勾的陶豆仍有发现，如T0708：11（图四：6）。因此，晚期B组与早期B组的年代当均与河姆渡文化中期对应（图四）。

对于楼家桥类型的性质，王海明认为楼家桥遗址下层“属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区的边缘与重叠地带”，其中“马家浜文化因素日益浓厚、强大”，“缺乏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不具备单独命名新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先决条件”[16]。发掘报告出版后，发掘者提出该类遗存“是一种存在于浙东平原与浙中山地过渡地带、兼容河姆渡文化与浙中山区未知文化（这种未知文化可能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传承有直接关系）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17]。之后，又进一步认为其属于河姆渡文化[18]，抑或是河姆渡文化的边缘类型，并将楼家桥类型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联系起来，建立起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序列[19]。而本文通过比较，梳理了楼家桥类型中两类外来文化因素，从中可以明显观察出早、晚两期马家浜文化因素持续增强、河姆渡文化因素不断减弱的发展趋势。浦阳江流域位于太湖、宁绍两大强势文化区之间，随着二者势力的消长，该区域的文化面貌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同时仍保留着自身文化特征。因此，将楼家桥类型划入河姆渡文化的范畴并不合理，这类遗存应为处于文化边缘地带，文化面貌与马家浜文化趋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支地方类型。



图四//楼家桥类型与河姆渡文化陶器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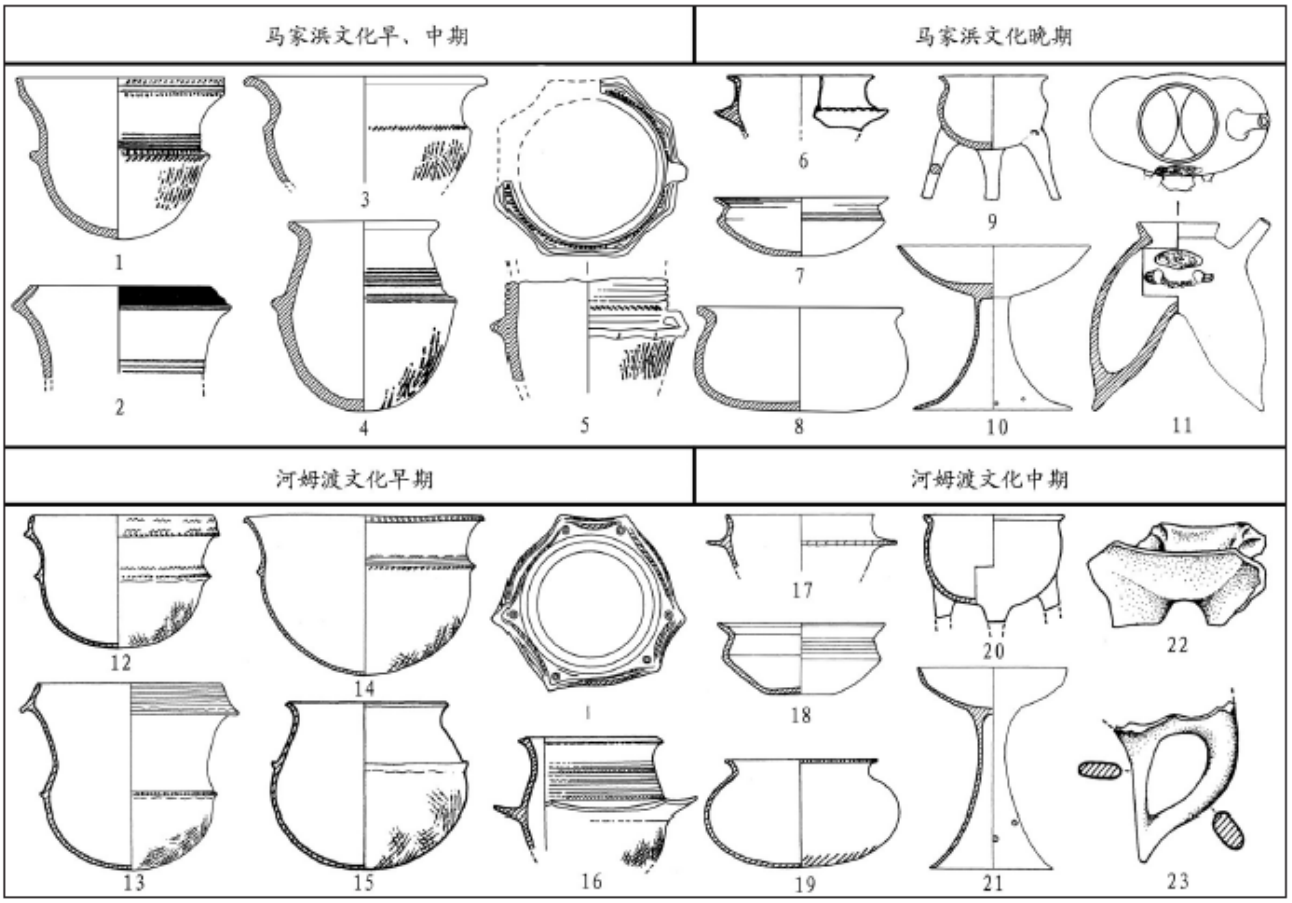
早期B组：1、2.釜（T0808：5、T0808A：5）3.鼎（T0810A：1）4.豆（T0809A：2）晚期B组：5.釜（T0808A：10）6.豆（T0708：11）河姆渡文化：7—10.釜（T231③B：298、T222③A：245、M22：2、T226②B：19）11.豆（M12：1）（1—6楼家桥遗址，7、8、10河姆渡遗址，9、11塔山遗址）



图五//楼家桥类型晚期 A 组与马家浜文化晚期陶器的对比

晚期 A 组：1—4.鼎（T0809A：11、T0808A：7、T0809A：13、T0810A：16）5.异形鬻（T0707：4）6.鼎足（T0807A：23）马家浜晚期文化：7.鼎（T11③a：2）8.罐（T505⑤：2）9.釜（T9③：4）10、11.异形鬻（T202⑤：1、H17：11）12.鼎足（T11③：2）（1—6 楼家桥遗址，7、9 崧泽遗址，8、10、11 庙前遗址，12 福泉山遗址）

学者们对楼家桥类型的年代问题也存在不同观点，王海明认为它大致相当于河姆渡遗址④A 层偏晚阶段至③层、马家浜文化中晚期[20]。发掘报告认为楼家桥类型早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 4 层晚、3 层早”，绝对年代的上限不晚于距今 6500 年，晚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②层，可晚至距今 5800 年[21]。通过上文分析，笔者判定楼家桥类型与马家浜文化晚期、以河姆渡遗址②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中期同时，参照目前学界对二者年代的推断，我们可认为楼家桥类型的绝对年代应大致为公元前 4400—前 4000 年[22]。



图六//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各时期陶器的对比

马家浜文化：1—6.釜（T117④：15、T108③、T114④：50、H5：1、H51：1、T1④：3）7、8.盆（M7：1、T133①：5）9.鼎（M17：4）10.豆（M5：1）11.异形鬶（T202⑤：1）河姆渡文化：12—17、19.釜（T213③B：131、T231③B：47、T226④A：171、T222③A：245、T30④：75、J1：25、BT42④：7）18.盆（J1：25）20.鼎（T231②B：22）21.豆（T243②B：12）22、23.异形鬶（T37②：1082、T35②：1081）（1—5、8 罗家角遗址，6、7、9 广福村遗址，10 吴家浜遗址，11 庙前遗址，12—18、20—23 河姆渡遗址，19 鲨架山遗址）

二、楼家桥类型形成的时代背景

楼家桥类型的内涵反映了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与东部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之间动态的文化交流。该过程在以罗家角、河姆渡为代表的遗址中表现明显。

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的文化堆积共分四大层[23]，其中第四、三文化层分别属于马家浜文化早、中期，第一、二文化层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24]。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③、④层为河姆渡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早、中期的年代相当，②层为河姆渡文化中期，在年代上与马家浜文化晚期相对应[25]。

罗家角的发掘者将遗址出土的陶釜划分为带脊釜、筒形腰沿釜、弧腹腰沿釜三大类，其中弧腹腰沿釜、Ⅰ式筒形腰沿釜[26]为马家浜文化的典型釜型，而带脊釜多与河姆渡文化陶釜的形制相同，应是受后者影响的产物。例如，在马家浜文化早期阶段，

罗家角遗址带脊釜 T114④：50 腹部拍印绳纹（图六：3），与河姆渡遗址 T226④A：171 相似（图六：14）；第四文化层中带脊釜 H5：1 斜腹内收，口部外翻（图六：4），整体形态与河姆渡 T222③A：245（图六：15）接近；带脊釜 T117④：15 及 T108③出土的一件陶釜口部残件（图六：1、2）均与河姆渡遗址中的同类器（图六：12、13）特征一致。

表一 罗家角遗址第一至四文化层各类型陶釜数量比的变化

文化层	带脊釜	弧腹腰沿釜	筒形腰沿釜	对应年代	
第一层	3.3%	71.2%	25.4%	马家浜文化晚期	河姆渡文化中期
第二层	4.9%	53.4%	41.6%		
第三层	14.8%	40.5%	44.7%	马家浜文化中期	河姆渡文化早期
第四层	32.6%	32.4%	34.9%	马家浜文化早期	

罗家角遗址简报中统计了三类陶釜的数量及比重，本文将其转绘为表一。由表一可知，马家浜文化早期带脊釜、弧腹腰沿釜、筒形腰沿釜的数量比大致相当，分别为 32.6%、32.4%、34.9%，至中期时，代表河姆渡文化因素的带脊釜比例突降至 14.8%。

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罗家角遗址中仅保存了少量河姆渡文化因素，以陶釜为例，带脊釜的比例已下降至 4.9%和 3.3%，弧腹腰沿釜成为最为主要的釜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河姆渡遗址中出现大量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河姆渡异形鬶 T37②：1082、T35②：1081（图六：22、23）应是源自罗家角 T135③：16 一类三足盉[27]。这一形态的陶鬶在杭嘉湖地区多有发现，如余杭庙前（图六：11）、长兴狮子山、荀山东坡、长命、潘板、南湖[28]等遗址，是太湖南部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典型陶器。河姆渡遗址陶釜 J1：25 带有宽大的腰沿（图六：17），也具有明显的马家浜文化特征。原先流行于河姆渡遗址③、④层典型的口沿内折陶釜已基本不见，而新出现的陶鼎、高柄圈足豆、折腹陶盆（图六：20、21、18）等器类均应为马家浜文化东渐的产物。

总体而言，马家浜文化早期，河姆渡文化占据较为强势的地位，以带脊釜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辐射远及杭嘉湖地区的罗家角遗址，但至中期时其影响已大为减弱。发展到晚期阶段，马家浜文化已由原来以文化输入为主的状态转变为强势的文化输出，致使宁绍地区的器物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处两大文化区之间、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楼家桥类型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兼有其他因素的多元文化面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浦阳江流域的文化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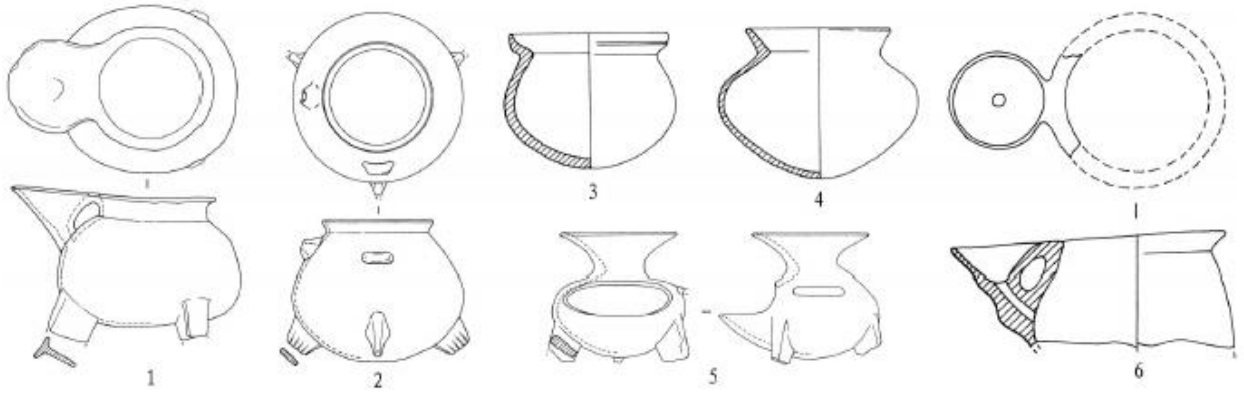
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是浦阳江流域前仰韶时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蒋乐平认为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29]。从出土遗物来看，上山文化以平底盆为典型器物，跨湖桥文化则大量流行绳纹陶釜，二者的内涵差异显而易见。不过，在上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开始出现少量圜底器和绳纹陶片，似乎说明其中已开始孕育跨湖桥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它们之间具体器物演变序列的梳理和完善仍有赖于以后新材料的补充。

前文将上山遗址南区④层以及开口④层下的灰坑归入跨湖桥文化，开口②层下的部分灰坑归入楼家桥类型，它们在层位上的相对早晚关系明确。绝对年代方面，跨湖桥文化距今 8200—7000 年[30]，楼家桥类型为公元前 4400—前 4000 年，二者之间还存在较大的时间间隔。但跨湖桥文化与楼家桥类型中均见有凹沿陶釜，这一标志性器物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嬗变关系，该地区使用陶釜的传统也一直延续。

至良渚文化时期，浦阳江流域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主要遗址有楼家桥上层、塘山背[31]等。前者堆积较薄，仅见有少量良渚文化的鱼鳍形鼎足。后者西发掘区清理 42 座墓葬，以鱼鳍形足鼎、T 形足鼎、双鼻壶、豆、簋等器类构成的主体遗存面貌与良渚文化无异。不过，随葬的素面陶釜、开膛三足器、T 形足盉（图七：1—5）等则不见于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这批墓葬

出土陶鼎 35 件，陶釜 9 件，后者的较高数量比也不同于典型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从其形制来看，陶釜均为素面，并见有凹沿的形态，该器物的沿用可视为当地文化传统的延续，表明了本区域内涵的独特之处。

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继良渚文化之后是以诸暨尖山湾遗址④—⑥层堆积为代表的钱山漾文化遗存[32]。发掘者指出，“如从大鱼鳍形鼎数量少、侧扁三足数量多的情况看，年代相当于钱山漾二期，与广富林年代相近”[33]。但本文认为遗址发表的侧扁足、弧背鱼鳍形足、鸭嘴形足等组成的器物群表现出明显的钱山漾文化特征，二者应属于同类性质的遗存。这一时期，陶釜已经消失，但以 T16④：35（图七：6）陶盉为代表的器类应承继自本地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代表着浦阳江流域的土著文化因素。



图七//良渚、钱山漾文化时期浦阳江流域的部分特色陶器

良渚文化：1、2.盉（M43：1、M27：3）3、4.釜（M8：1、M25：4）5.开膛三足器（M44：5）钱山漾文化：6.盉（T16④：35）（1—5 塘山背遗址、6 尖山湾遗址）

总体而言，新石器时代的浦阳江流域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楼家桥类型、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五支存在年代早晚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它们之间年代间隔较大，文化序列不连贯，但始终保持有相对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从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将这五支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归纳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独立发展期，主要包括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这一时期周边区域还不见有史前遗存的分布，浦阳江流域可谓一枝独秀。第二阶段为融合过渡期，主要包括楼家桥类型。随着东西两支强势文化的崛起，浦阳江流域传统式微，并逐渐过渡为太湖文化区的边缘地带。第三阶段为转变成型期，主要包括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至此，除少量器物上仍可见到土著因素的沿袭外，浦阳江流域的文化面貌在整体上已十分接近太湖流域，成为太湖文化区南向的拓展地带。

以上三大阶段对应着浦阳江流域本地文化系统的发展及与太湖地区文化系统的融合。赵宾福先生将这类存在文化系统更迭的区域概括为“序列文化区”[34]。而其中的楼家桥类型不仅是在空间概念上处于强势文化边缘、带有自身鲜明特征的一个地方类型，同时也是在大的时间框架下衔接当地与外来两大传统、处于文化系统转变节点的一个过渡类型，是考察文化边缘地带与序列文化区遗存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小结

楼家桥类型地处强势文化边缘，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中期，出土遗物的地域特征明显，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楼家桥类型早、晚两个阶段的遗存清晰地反映出马家浜文化因素增加、河姆渡文化因素减少的变化

过程，这正是马家浜文化在浙江北部浦阳江、曹娥江流域强势扩张的表现。通过纵向考察浦阳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我们将其归纳为独立发展、融合过渡、转变成型三个大的阶段。楼家桥类型时期，浦阳江流域考古学遗存的独立性已大为减弱，逐步演变为太湖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在这之后，当地土著传统虽仍有延续，但文化系统已发生更迭，作为序列文化区的浦阳江流域成为太湖文化区的势力范围。

参考文献：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 2010 年。报告中将自身特征鲜明的楼家桥遗址下层称为“楼家桥文化类型”，本文称之为“楼家桥类型”。

[2] 蒋乐平：《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460 页。

[3] 同 [1]。

[4] 同 [1]，第 77 页。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浦江上山》，文物出版社 2016 年。

[6]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7] 方向明：《马家浜——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1999）》，西泠印社 1999 年。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 年第 9 期。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塔山》，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11] a.王海明：《河姆渡遗址与河姆渡文化》，《东南文化》2000 年第 7 期；b.郭梦雨：《河姆渡文化分期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20 辑，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2] 同 [11] b。

[13]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 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 年第 3 期。

[14]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16] 同 [11] a。

[17] 同 [1]，第 302 页。

[18] 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 年第 6 期。

[19] a.同 [10]，第 286 页；b.同 [5]，第 281 页。

[20] 同 [11] a。

[21] 同 [1]，第 78、302、303 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23]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24] 同 [7]。

[25] 同 [11]。

[26] 罗家角遗址筒形腰沿釜分为三式，其中Ⅰ式为马家浜文化典型釜形，Ⅱ、Ⅲ式则具有明显的骆驼墩文化特征。

[27] a.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b.牟永抗：《试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2 年；c.黄宣佩：《陶鬶起源探讨》，《东南文化》1997 年第 2 期；d.十工：《以薛家岗早期墓葬出土的陶鬶为例——兼谈马家浜至崧泽早期长江下游鬶的源流》，《文物研究》第十七辑，科学出版社 2010 年；e.方向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盉鬶的若干问题——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五十周年》，《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图文集》，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1 年。

[28] 嘉兴市文化局：《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年，第 110、111、120 页。

[29] 蒋乐平：《跨湖桥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86—190 页。

[3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31] 同 [1]，第 131—217 页。

[32] 同 [1]，第 218—286 页。

[33] 同 [1]，第 306 页。

[34] 赵宾福：《从并立到互动：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格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